

在近日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、精准的总结、提炼。这一重大论断,将中华文明置于文明传承、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,从而准确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人类文明的民族特征。

昨日起,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试运行。66亩占地面积、5.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、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……这一全新文博打卡地势必再次掀起一场古蜀文明的关注热潮。

从4500年前的悠悠宝墩,到“沉睡数千年、一醒惊天下”的三星堆,再到3000多年前的璀璨金沙……古蜀文明拥有漫长的历史,既具备鲜明的文化个性,以宝墩古城、高山古城和郫县古城为代表的8座史前古城遗址群,又有力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;而三星堆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遗址以及出土的各种精妙绝伦的金器、青铜器和玉器,不仅彰显了古蜀文明在数千年前达到的高度,更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华大地其他区域文明的联系,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及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古蜀文明如何印证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的五大特性?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,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?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之前,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、考古学家卜工,为读者解密这些问题。

三星堆两件大型青铜器近日实现「数字化」复原



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相对完整形态

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相对完整形态
新华社发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吴亦铮/文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

7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内景 新华社发

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昨日对外开放,全新文博打卡地再掀古蜀文明关注热潮

记者专访考古专家王巍、卜工,解析古蜀文明如何有机诠释中华文明五大特性

中华文明星空中 璀璨一颗星

对话嘉宾

王巍,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三星堆遗址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



文物“活起来” 民众看得懂、有兴趣、受教育

记者:请问您对新馆有何期待?
王巍:我上大学时就对三星堆很感兴趣,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遗址,有很多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工作,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风貌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个单位承担发掘任务,联合39个科研机构展开多学科结合研究。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,无论工作理念、工作方法,还是采用的科学技术、出土的珍贵文物以及获取的历史信息,都是践行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考古学”的有益尝试,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考古学的一个样板。
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的文物如何“活起来”?除了专业人员研究阐释外,博物馆、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本身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。文物“活起来”就要让民众看得懂、有兴趣、受教育,这三者是

相互联系的。我期待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像三星堆遗址一样,成为文博界的一个样板。

中国青铜文明 “百花园”的绚丽花朵

记者:不久前你去了成都宝墩遗址工作站,宝墩文化被誉为古蜀文明的摇篮,您对此如何评价?
王巍: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最初的阶段。从三星堆到金沙,古蜀文明的高峰其实都是因宝墩文化这一摇篮孕育的。在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展厅,我们可以看到宝墩文化的发展历程,让观众在参观中感受古蜀文明。
记者:20世纪90年代,宝墩古城等六座成都平原史前遗址群的发现,为人们想象三星堆之前的成都平原文明提供了考古学依据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,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,宝墩、三星堆相继被纳入其中,成为长江上游区域文明研究的重要实证。目前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哪些丰

交汇融合 成就古蜀之光

对话嘉宾

卜工,考古学家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,暨南大学客座教授。著有《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》和《历史选择中国模式》《礼证中华》等



蚕丛在拓荒 鱼凫到高峰

记者:在您看来,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金沙,古蜀文明呈现出怎样一种发展状态?
卜工:很多人都熟悉李白那首《蜀道难》: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!”蚕丛和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的两位。以前五代蜀王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,但通过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,古蜀国“五代蜀王”都能找到对应的历史节点。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,宝墩遗址对应的可能就是初代蜀王蚕丛,而三星堆遗址对应的则可能是鱼凫。这样来看,蚕丛可能是古蜀文明的拓荒者与开创者,而鱼凫时期古蜀文明发展到了高峰期。
宝墩文明和三星堆文明在文化上存在延续性,这在考古领域是公认的话题。宝墩遗址出土了一根长约1.04米的象牙权杖,这根权杖与三星堆祭祀器

物坑出土的金杖,在形制上非常相似。三星堆出土的绳纹花边口罐、喇叭口罐、宽沿尊、盘口尊、敞口圈足尊、浅盘豆、高圈足等,都是宝墩文化中的典型陶器。对于两者的关系,我们可以打个比方:如果说三星堆文明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,那宝墩文化就是滋养这棵大树的土壤。
至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,其年代大致在商周之际到春秋前期,其中黄金面具、青铜立人等无疑是典型代表。至此,古蜀文明从宝墩古国到三星堆、金沙王国的历史进程就清晰地呈现出来。

“文化统一”的 典型范例

记者: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既有联系,又存在鲜明的个性与创新。
卜工:实际上在夏代及以前,中华大地上就有许多区域文明出现,其

硕果?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?

王巍: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阶段,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和发展历程;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;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,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;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,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;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与发展的脉络——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,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、延续至今的文明。搞清楚起源、形成与发展的过程、背景、动力、机制、特点,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,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世界文明研究的贡献。
宝墩、三星堆被列入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,它们和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·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,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华文明星空中璀璨的一颗星。

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支,是中国青铜文明“百花园”中绚丽的花朵,向国人和世界展现出中国青铜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,同时也为研究中原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关系,以及各地区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,提供了难得的资料。这种一体化的进程,还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古蜀文明 印证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

记者: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

容性、和平性,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“精准画像”,意蕴深刻,引人深思。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是如何体现这五个特性呢?

王巍:在4000多年前的宝墩时期,长江上游地区已进入到初期文明阶段,区域性的文明开始出现。夏商时期的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金沙,展现了古蜀文明连续的过程。而古蜀各个时期以蜀王为中心,族群替换,金沙王国对黄金的重视以及对玉礼器、青铜祭祀用具的使用,都与三星堆相似,体现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、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。

创新方面,比如三星堆的青铜神树,就是分别铸造,再以整体熔接的技术制造完成的,这样的技术虽然在商朝就已经有了,但不普遍。这一点也反映出了古蜀文明的创新性。
对龙的崇拜是黄河流域6000多年的信仰。三星堆遗址出土了10种龙形象的器物,力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。同时,三星堆、金沙的玉礼器也是夏商玉文化在古蜀的延续与发展。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,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,其中古蜀文明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容特征。三星堆、金沙遗址的青铜冶金技术来自商王朝,都有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器制度,这些先进技术和制度都是从长江中游传入的,说明古蜀文明虽是一个区域文明,但同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,令自己不断更新。

最后要说的是,三星堆、金沙出土的器物几乎都是与祭祀礼仪有关的青铜器、玉器,却鲜有兵器出土,这一点说明古蜀王是通过信仰体系来实现统治的,可以一窥古蜀文明的“和平性”特征。

用文化与智慧改变世界

记者: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,具备极强的包容性?
卜工: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文明的交汇融合,成就了古蜀的高度文明。这支文明虽然地处中国西南内陆,身在崇山峻岭环绕之下,却并不闭塞孤立,反而积极与外部交流沟通。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文物中,玉琮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带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,陶盂、玉璧、玉璋等与黄河流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,铜兽面与长江中游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等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这些都是文化包容性在古蜀文明中的体现。
记者:您怎样理解古蜀文明的“和平性”?

卜工:爱好和平不等于不打仗,更不等于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。古蜀国的军事实力其实非常强。武王征商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牧野奇迹,在这场战争中,古蜀国军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古蜀国虽拥有惊人的军事实力,但古蜀先民却爱好和平。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可以证明当时古蜀人的精神世界极为丰富,他们渴求沟通神灵、希望用文化与智慧来改变世界,但又不热衷于使用武力去征服。中华文明同样如此,纵览史书,我们很少看到中华文明去侵略、占领其他文明,反而是因为自身文明的高度发达,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,让自身的影响力辐射越来越远,越来越大。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,在爱好和平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

Focus 聚焦

20

成都日报



2023年7月28日
星期五